



小党与民主政治：纽西兰绿党的经验初探

作者：彭滢雯 更新时间：2006-10-22 20:54:24 来源： 点击率：594

绿党是今日世界唯一跨国、跨洲结盟的政党，也是一股全球性的政治现象。绿党所代表的绿色政治运动，为20世纪的最后30年间的民主政治史，添上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记录，而其关怀面向绝对不是传统认知的「环境保护」而已。特别在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主流拥抱的典范的今日，绿党党员不仅持续从永续与公平正义的角度，对经济全球化提出批判，且更进一步提出替代政策愿景与主张，足以看出绿党政治对于「实践」的使命感。尽管世界上已有80多个国家有绿党，但目前有关绿党或绿色政治的研究与文献，仍习以德国绿党为代表。然而，德国绿党得利于该国在战后反威权的社会传统和选制设计，使其发展相对顺利，却因此缺乏了大多数国家绿党惨淡经营的经验。相对的，全世界第一个全国性绿色政党——纽西兰绿党——却是在成立后24年才因选制改变而得以进入国会，并且自1999年起成为执政联盟重要的「支持政党」。因此，本文回顾纽西兰绿党的崛起、苦撑、瓦解与新生之艰苦过程，及其目前面对的挑战，可望在德国经验之外，提供读者对于绿党政治更多面的启发与思考。

壹、前言

绿党是今日世界唯一跨国、跨洲结盟的政党，也是一股「全球性的政治现象」(global political phenomenon) (Dann, 1999:48)。受到1960年代西方一波波新社会运动与各种绿色思潮的影响，绿党于1970年代起出现在澳、纽和西欧一些国家；1979年至1980年代初，瑞士、比利时、西德等国绿党先后进入国会，带动欧洲各国成立绿党的风潮；进入1990年代，绿党在其它各洲也明显地萌芽发展。2截止2005年为止，全世界至少有87个绿党或准绿党(绿色政治运动团体)，并且分属欧洲绿党联盟(European Federation of Green Parties/ European Green Party)、非洲绿党联盟(Federation of Green Parties of Africa)、美洲绿党联盟(Green Parties Federation of America)和亚太绿色联机(Asia-Pacific Green Network)。32001年4月，超过70个国家的绿党或绿色运动人士齐聚澳洲堪培拉，宣布成立全球绿党(Global Greens)，通过全球绿党章程(Global Greens Charter)，确认以生态智慧、社会正义、参与式民主、非暴力、永续、尊重多元等六项规范性原则，为各国绿党发展政策的基础(Blakers, 2001)。

绿党所代表的绿色政治运动，为20世纪的最后30年间的民主政治史，添上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记录，而其关怀面向绝对不是传统认知的「环境保护」而已。如同刘东国(2002)指出的，绿色政治的诞生应归诸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经济与社会结构转化，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观念和价值取向转变的结果。换言之，绿色政治是不满物质主义支配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社会与自然系统的毁灭性建设/掠夺，而决定介入体制改革的反对力量。这股新的社会力量提出新的政治要求，挑战并超越了传统左右之分的政治立场、过程和议题。特别在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主流拥抱的典范的今日，绿党党员不仅持续从永续与公平正义的角度，对经济全球化提出批判，且更进一步提出了替代政策愿景与主张(如Woodin & Lucas, 2004)，足以看出绿党政治对于「实践」的使命感。

尽管世界上已有80多个国家有绿党，但目前有关绿党或绿色政治的研究与文献，仍习以德国绿党为代表(如Capra & Spretnak, 1984; Frankland & Schoonmaker, 1992; Poguntke, 1994)。然而，虽然德国绿党确实因着战后国内反威权的社会氛围(Capra & Spretnak, 1984: Ch.1)，以及该国「比例代表两票制」之选举制度等利多因素，而早在1983年(成立第四年)就得以大举进入国会(一次当选28席国会议员)，成为全世界发展得最为稳定，也是最早进入执政联盟的政党；但也正因其发展之相对顺利，缺乏了大多数国家绿党惨淡经营的经验。相对的，全世界第一个全国性绿色政党——纽西兰绿党4——却是在成立后24年才因选制改变而得以进入国会，并且自1999年起成为执政联盟重要的「支持政党」(Support Party) (Bale & Dann, 2002)。因此，纽西兰绿党的崛起、苦撑、瓦解与新生之艰苦过程，可以在德国经验之外，提供读者对于绿党政治更多面的启发与思考。

本文前半部回顾纽西兰绿党成立至今的历史经验(并可参见附表二之整理)，后半部则进一步讨论绿党作为一个运动取向的小党所面临的内外挑战——这是一个至今仍持续上演的辩论。本文数据主要来自一位重要的报导人，即纽西兰绿党前共同召集人(Co-Convenor) Christine Dann博士。她的博士论文(Dann, 1999)以及两篇以绿党为主题的单篇论文(Bale & Dann, 2002; Dann, 2005)，是少数专门讨论纽西兰绿党的英文文献。同时，作者在2005年10至11月间与Dann博士数度以电子邮件往返，透过邮件访谈的方式，得以针对本文的关切直接追问，并实时掌握2005年大选后纽西兰绿党内部的因应策略。此外，本文也参考其它已出版或公开的次级数据，包括纽西兰绿党及其它政党网页、国际新闻报导、现有相关研究文献等，以对Dann提供资料进行考证和补充。但作者仍承认本文内容过度仰赖单一报导人意见所可能有的局限。

1972年5月30日，曾经担任过记者的24岁政治系研究生Tony Brunt在纽西兰首府威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演讲，首度公开抛出成立政党的主张。他强调应当有一个政党是为人民的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努力，而非只着眼生活水平（livingstandards）。前者必须从创造小区共同感、发展人性价值5等面向努力，而不是过度强调经济成长、生产、消费、获利和科技进展。当时的两大党——执政的国家党（National Party）和在野的工党（Labor Party），即使因着纽西兰重视自然的文化传统，而对于环境保护议题不至于轻怠，但他们采取的立场仍是「技术中心」（technocentric）取向的，亦即相信人类可以，也应该，透过科学和技术的演进，持续促进经济成长，环境问题则可在现行政治社会秩序之下透过技术获得「管理」（Dann, 1999:249-52）。Brunt在他的演讲中对此提出批判，他反对政府一味追求经济成长，因为成长有违永续原则，将以后代子孙的生活为代价；他同时主张应监督甚至禁止没有必要或是有害的新科技、减少城市中的汽车、政府去中心化、更重视地方发展、减少工时，乃至于在外交上，他主张如果法国继续在太平洋进行核子测试，则应与法国断交（引自Dann, 1999:257-59）。

Brunt的诸多政策主张并非诞生于真空，而深受1960年代在各个工业化国家窜起的学生与新社会运动之论述启发。如同Dann所回顾的，全球间各种反体制的新闻事件、组织和主张，诸如柏克莱大学的言论自由运动、美国南方的民权抗争、法国境遇主义者（French Situationists）对日常生活的批评、妇女解放运动的反选美与游击剧场行动、反越战的大规模聚会、辩论和座谈、石墙事件引发的同志运动、法国的学生与工人街头抗争、英国的反核子武器游行等等，「都透过电子或平面媒体的媒介而传到了纽西兰」（ibid. 253）。除此之外，在1960与70年代纽西兰的年轻人很流行到国外（特别是西方英语系国家）出游，甚至有种说法是如果没念大学、没有海外经验，则不算受到完整的教育。这样的趋势也强化了纽西兰年轻人对于国际间革命般的氛围之掌握，各种议题的新社会运动和组织也早在纽西兰生根。这也是为什么价值党的发起人之一Norman Smith在接受Dann的访谈时，针对为什么世界第一个绿色政党会在纽西兰诞生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只有一个字：「数据库」databank（ibid. 254）。

第一次参选

于是，虽然Brunt的演讲听众只有60人，但确实找到了一些认同组党理念的年轻人，让组党参选的构想付诸实践。在接下来几个月，Brunt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其中许多是他之前的媒体同事）展开小型非正式的聚会，并且在四个城市设立了分部，为年底选战进行筹备。只不过直到1972年10月（选前一个月），价值党只提得出9名参选人。但是，情势在该党的第一份选举文宣《纽西兰的蓝图：一个另类的未来》（*Blueprint for New Zealand: An Alternative Future*）出炉后，有了急遽转变。该份文宣引起媒体广泛注意与报导，Brunt进而被邀请上一个黄金时段的节目。在该节目于10月17日播出后，回应与支持声浪如排山倒海地涌入，主动报名愿意代表参选的人也纷纷出现。1500份的文宣不仅在一周之内销售一空，甚至还有2000份的预订。选举文宣成为畅销书，创下纽西兰首见纪录。价值党在10月的第三个周末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也成为新闻焦点。到了11月2日，该党提名的42人终于凑齐了保证金，宣布参选，平均年龄29岁。首次参选的他们，自然想出许多花招，诸如抗议汽车秀、以摇滚乐团助选、街头戏剧表演、现场辩论等，也获得媒体（相对于其它候选人）较多的报导。当然，价值党最重要的特色还是在其不同于两大党的激进政见，包括经济零成长、人口零成长、放宽堕胎限制、同性恋除罪、和平反战与反核等（Dann, 1999, 2005）。第一次参选结果，价值党全国得票率为2%，并且在13个选区中成为第三大党，初试啼声算有不错的成绩。

大选过后，价值党第二次全国大会随即于1973年2月召开。作为一个绿色政党的理念与实践之间的两难，在会中针对该党组织发展方向的辩论中清楚显现。一位曾经批评过Brunt、但后来仍代表「青年行动中心」（Youth Action Centre）加入价值党参选的青年Guy Salmon，在会中积极主张价值党应采取没有领导人、完全去中心化的组织方式，将所有政策制定、决策和曝光的机会下放到各地区，中央只保留一位处理行政事务的秘书。此一无政府主义理念确实是那个年代「新政治」运动常见的想象之一。因此，虽然会中有另一种声音——认为一个符合民主过程经选举产生的领导组织，较能够避免破坏性的无政府主义，让价值党较有效率地运作——但会议最后Brunt等领导人仍接受了无政府倾向的提案，价值党也就此进入17个月完全权力下放的无政府实验（anarchist experiment）阶段（Dann, 1999:282-83）。7价值党的另一位创党成员Dave Woodhams在接受Dann访谈时，直指这个「无领导人」的决定是造成价值党重大创伤的错误判断，缺乏领导与协调机制，使得价值党错失发展良机，党员和外界的信任也大幅流失。然而，Woodhams也承认这样创伤有其正面效应：因为这次教训，以后纽西兰绿党党员对于组织运作的想象，不会轻易被教条的论述主张所操弄（ibid. 283）。

这场无政府实验才进行一年就已经展现了毁灭性效果。担任中央唯一行政秘书职务的Catherine Wilson在2月党内通讯Linkletter中指出，价值党的36个地方分支只剩下三分之一还在运作，党员剩下约600名，其中只有128名缴党费。眼见该党濒临瓦解，Wilson和Dave Woodhams在与Brunt讨论后，决定再次召开全国大会修改组织架构。于是，价值党第三场大会于1974年8月底召开，选出Reg Clough为领导人，Catherine Wilson为副领导人，并选出一个全国执行委员会。在这次重整之后，党员人数增为2000名，并且得以募得足够的经费雇用两名专职人员（ibid. 285-88）。虽然拥有中央级领导组织，但是这次大会也兼顾了党员参与机会的极大化，因此在党章增修条款中规定：「一项政策只要能在较低层级单位有效地决定，就不需要提报到较高层级单位去决定」（Dann, 2005:12）。由此可以看出改组后的价值党在追求组织效率的同时，并不因此放弃参与式决策的理想。

第二、三次参选

重组后的价值党随即为1975年大选展开筹备，这一次有相对充裕的时间，他们推出了一份比上次更为轰动的竞选文宣——长达90页的党纲《超越明天》（*Beyond Tomorrow*）。文宣本身的吸引力，再加上党员挨家挨户的推荐，这本党纲畅销的程度到了光靠卖书收入就足以支持该党选举开销（Dann, 1999:288）。更重要的是，它不仅在纽西兰大卖，也传播到西欧许多国家，Capra & Spretnak（1984）甚至指出「这份政纲对全世界生态学家和未来学者都有很大的冲击力量」（引自杨祖珺、蔡式渊译，1986:165）。这次选举，价值党

更跃进一步，得票比例占全国5.3%。如同Dann 指出的，同样的得票率在西德早就为绿党赢得超过20 席的国会席次了。但在纽西兰，因为当时仍然采取FPTP 简单多数决（First Past The Post，或称「首先跨越门坎者当选」制度），每一选区只有最高票者能当选，因此价值党并未拿下任何席次。在FPTP 简单多数决造成的西瓜效应之下，1978 年价值党第三度参选的得票率下滑为2.8%，也造成该党第二度的瓦解危机。事实上，在1975 到78 年间，价值党的党员和捐款都有所成长，但潜在的绿党选民，甚至一些已缴费的价值党党员，为了让保守的国家党首相Robert Muldoon 下台，而策略地（或无奈地）投票给工党。这次选举的退败，再度引发了党内的路线辩论甚至个人攻讦。在选后检讨会议上，有关价值党究竟要不要自我定位为社会主义的政党一案，引发热烈辩论。赞成社会主义定位的提案原本胜出，但是提出此案的一群 Christchurch 市党员，却因为原任党领导Tony Kunowski 没有获得连任，愤而退党。曾经历「没有无政府主义者的无政府政党」阶段的价值党，如今又即将成为「失去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政党」（Dann, 1999:289-90）。

新当选的领导是来自奥克兰的Margaret Crozier 女士，也是纽西兰政党史上第一位女性党主席，不过她面对的却是党员分裂出走、难以挽救的处境。1980 年代的三次大选（1981, 1984, 1987），价值党不再打整体战，只剩下一些零星的「硬颈」候选人独立参选。纽西兰绿党网页的〈历史篇〉也坦言1979 到89 这十年期间，「价值党的存在是精神面大于实质面」。8到了1989 年，党员人数剩下200 人左右。绿党（潜在）核心成员的能量，则是分散在各种不同的市民运动之上，其中特别值得一提是选举改革联盟（Electoral Reform Coalition）。该联盟的发言人Rod Donald后来成为绿党的共同领导人之一，并当选国会议员至今（Dann, 2005:14-15）。9

1989 年底，有一些原本不属于价值党的独立绿色参选人，参加地方选举，并有一些人当选，因此他们考虑组党投入次年的大选。1990 年3 月这些新生绿色政治势力与价值党的党员开会协商结合的可能，并且于5 月的会议中确定结盟。这个结盟的成果就是今日的纽西兰绿党（Green Party of Aotearoa New Zealand）（Dann, 2005:18），并随即投入年底大选。

参、结盟以求壮大的「联盟党」时期（1991-1999）

在1990 年的大选中，整装重新出发的绿党终于扳回情势，得到全国6.9%的选票。虽然这次是以新的党名参选，但绿党被政府肯认是「价值党」的延续，而非一个新的政党，因此得以享有全国电视播出的政党广告时间。不过再次地，即得到自1972 年价值党成立以来最多的选票，在FPTP 简单多数决制度下，绿党仍未获得任何国会席次。为避免支持者流失的历史再度上演，推动选举制度的改革自然成了当务之急。

1991 年4 月，合并后的绿党首次召开全国大会，由两位共同召集人（一男一女）负责筹划，会中并确认了四名发言人（两男两女）作为对外发言窗口。此时的绿党的正式缴费党员不到500 人，行事程序都还延续着价值党时期的「共识决」，但已开始草拟党章以便将组织结构正式化。不过该份党章直到1994 年才定案，且因为后来绿党不久后即加入「联盟党」（见下段），因此直到1998 年才开始落实党章（参见最后一节「对内组织」）。不过这次大会中确认了绿党的组织运作原则不变，即不管哪一层级的组织，都以参与最大化（maximizing participation）为原则（Dann, 2005:10-11）。

由于意识到自己独立参选的力量不够强大，同时为了推动选制改革，绿党于1991 年12 月加入了由左翼的新工党（New Labor Party，脱离工党而独立）发起的联盟党（Alliance）。这个联盟党成员包括五个小党：新工党、绿党、民主党（Democrats，原本的社会信用党）、自由党（Liberals，脱离国家党而独立）以及一个为毛利人权益代言的政党Mona Motuhake。联盟党在1993 年第一次参选，获得高达18.3%的选票，成为纽西兰政坛的第三大势力。不过，在当时的选举制度下，只获得两席国会席次，系（原属新工党的）JimAnderton 和Sandra Lee-Vercoe 分别在选区胜出。

所幸，联盟党大力推动的MMP 混合比例代表制（Mixed MemberProportional），在与民间运动力量的结合下，通过1993 年全国公投。这项公投成果，就此改变了纽西兰原本的两党独大制度，而成为需要大小党协商结盟才能稳定执政的局面（Aimer & Miller, 2002）。

1996 年的大选结果证明绿党加入联盟党的阶段性目的已经达成。联盟党获得10.3%选票，在不分区席次分配后，一口气将13 名联盟党代表送入国会，包括3名绿党代表Jeannette Fitzsimons、Rod Donald、Phillida Bunkle（前两位于1995 年起担任绿党共同领导人至今）。这也是纽西兰绿党发展24 年来首度进入国会（Dann, 1999:19-20）。在MMP 混和比例代表（两票）制提供的机会结构中，绿党有相对的空间选择是否持续参加联盟党，有关绿党应否离开联盟党的讨论也就此展开。

策略结盟当然有利有弊。好处之一是可以交流彼此的关心重点。例如联盟党在1996 年大选前推出的一份具有社会民主色彩的文宣，融合环境保护、社会福利经济、毛利人权等主张，就是跨党结合参与的成果。不过，跨党结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主导权的问题。Dann 在接受作者的email 提问时表示，由于联盟党一直是由新工党所主导，其领导人JimAnderson 风格偏向集权，与绿党的原则不甚兼容，也让绿党的主体性相对受限（Dann, 2005/10/19 e-mail）。因此，绿党在1997 年决定下次选举脱离联盟党独立参选。不过，3 位绿党出身的国会议员仍留在联盟党到1999年9 月任期届满。

肆、作为工党之「支持政党」的今天（1999-2005）

Tim Bale 和Christine Dann 曾经在2002 年发表一文，非常适切地以「支持政党」的概念来描述纽西兰绿党的角色。相对于过去一般认为政党若非「执政」就是「反对」的二分法，所谓的支持政党指的是因为意识型态上的左派（或右派）立场，而注定支持某一（理念相近之）大党执政的小党。以绿党的例子来看，自1999 年脱离联盟党独立参选之后，连续三次大选（1999, 2002, 2005）都是工党取得执政权。绿党既未（能）正式加入执政联盟，却因为是重要合作与咨询对象，并不全然处于在野监督的位置，因此成为工党的支持政党。

1999 年大选年年初，决定独立参选的绿党民调不到1%，唯一的资源是两名国会议员Fitzsimons 和 Donald 的全力带动。在这一年之间，绿党以反对基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 GE）为重点政见，其选

举策略成功地突出绿党特色（因为以农业为主的纽西兰，有一群坚强主张有机和生态农业、反对基因作物的选民）；加上对手国家党对于绿党参选人的攻击，反而有提高绿党知名度的效果，吸引了一些原本不投票的人的注意，民调终于从年中的1%逐渐爬升到选前有了5%。不过，在11月27日选举当天，绿党并未过5%门坎，而是在投票后10天，也就是「特殊投票」（special votes）计票完毕之后，才确认以5.16%的得票率惊险过关，获得6名不分区的席次。这次大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共同召集人Jeannette Fitzsimons在Coromandel选区当选，这是纽西兰绿党第一次在FPTP简单多数决的区域性选举中胜出。12换言之，这次选举让绿党一口气当选7位国会议员。

拥有独立进入国会能力的绿党，理论上应是工党潜在的结盟伙伴。因为1999年是工党自1990年败选后重新夺回执政权的一年，势力有待稳固。但由于绿党选前并不被看好，工党主席Helen Clark很早即与联盟党敲定联合执政，由联盟党的领袖Jim Anderson担任副首相。加上选后绿党席次确认较晚，工党与联盟党也知道一定能获得绿党信任，因此并未改变其选前两党联盟的默契。13不过，此一中间偏左的执政联盟，仍需要绿党支持才能稳定施政，因此绿党虽未入阁，但与执政联盟有多次的正式沟通，也拥有对某些议题的发言权。

基因工程议题在2002年大选中再度成为绿党的一大助力。这是因为纽西兰政府禁止种植基因改造作物的暂缓令（moratorium），将在2003年10月到期，而Clark总理已暗示她不会延长此一禁令。绿党表明如果Clark开放基因改造农作物，则绿党将让政府难看。绿党在选前即被媒体视为「最有机会否决Clark女士之工党政府的政党」，15也因此Clark批评绿党是在对她的内阁勒索，媒体甚至形容基因改造作物议题是Clark政权面临的一次的政治危机。16部分因为这个议题的话题性（尽管2003年10月基因作物禁令仍是开放了），使得绿党在这次大选中获得了7.0%选票，得到9席国会（不分区）席次，这也是纽西兰绿党至今的最佳选举纪录。

然而，这次选举中绿党与工党的尖锐对立，却使得Clark选择继续与Jim Anderson从联盟党出走后另组的进步联盟（Progressive Coalition）组成执政联盟，并获得联合未来党（United Future）的信任支持。绿党再次被排除于执政联盟之外。讽刺的是，执政联盟的许多政策仍遭到联合未来党反对，而必须仰赖绿党的支持才能通过。

甫揭晓的2005年10月大选结果，工党仅以1席领先对手国家党，执政基础相对更为脆弱，因此Clark总理在大选之后立即以争取最多小党的支持为协商目标。绿党在这次大选的得票小幅滑落为5.3%，只有6名国会议员获得连任，不过仍是第四大党（参见表一），并且明确表达了参与联合执政的意愿。但是因为联合未来党和纽西兰第一党在协商过程中表明，只要绿党加入执政联盟，他们就不加入，因此Clark最后采取的策略，是在延续与Jim Anderson之进步党的执政联盟之余，另提供联合未来党以及中间偏右的纽西兰第一党，各一个部长职位，以交换该两党的信任投票（Dann, 2005/10/7 email）。

绿党在与Clark政府数周的协商后，勉强达成了协议，在新执政联盟的信任投票时弃权（不予反对），以交换Clark执政联盟对诸多绿色政策的承诺。18不过，连续三次的被意识型态上的「盟友」排除于执政联盟之外（即便工党确实有别的压力与考虑），而仅能成为执政联盟的支持政党。这难道是绿党作为一个坚持进步原则的小党的宿命？绿党对此又有什么样的反省？

表一：2002年与2005年纽西兰大选结果比较¹⁹

2002	席次	2005	席次
工党	52	工党	50
进步党	2	进步党	1
绿党	9	绿党	6
N/a		毛利党	4
联合未来党8		联合未来党	3
纽西兰第一党	13	纽西兰第一党	7
国家党	27	国家党	49
行动党	9	行动党	2

伍、外部串连：是支援还是俘虏？

自1999年独立参选并获得不错成绩之后，绿党就开始对于自己可能（依循德国模式）加入执政联盟的机会有所意识，也对于加入与否的利弊均有讨论。加入执政联盟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包括拥有部会席位，可以掌控预算并主导政策方向，并且对于整体政策有更直接的讯息来源和介入机会。可能的风险则包括要承担执政联盟整体决策的成败责任，以及对于某些政策原则的妥协，可能影响自己下次的选票。后者的考虑对于才开始建立基础的绿党而言非常关键。因为绿党的支持者多半是有着清楚原则与主张的理念派（也正因此才能够抵抗西瓜效应而愿意投给绿党）；如果选民发现绿党为了维持权力基础，而在基本原则上有所打折，则可能立刻予以批判或扬弃。

作为一个小党的独立品牌形象（brand identity），也一直是绿党讨论是否加入执政联盟时的重要考虑。Bale & Dann就指出，即使1999年绿党被邀请联合执政，也很可能不会答应。当时党内的考虑有三：首先，作为一个政坛的新鲜人，1999年当选的7名国会议员中，只有2名曾经有过问政经验，因此绿党相对生涩的政治经验，可能使得它在进入联盟后被工党、联盟党操弄。其次也是较为个人的理由在于，绿党在联盟党内与其领导人Jim Anderson已经合作过6年，并也领教过他的集权风格，因此并不那么乐意与其再度共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考虑，则是绿党认为在此阶段就进入执政联盟，容易模糊绿党作为一个独立政党的形象（2002:354-55）。有点讽刺的是，即使绿党并未加入执政联盟，但在2000年的一项民调中，却有40%的纽西兰选民还是以为绿党就是执政联盟的成员之一（ibid. 353）。

支持政党的角色在理论上可以满足并响应前述所有的顾虑和期待。首先，因为没有加入执政联盟，绿党可以拥有相对自主的形象和议程；其次，以支持角色给予信任投票，可以确保意识型态与绿党相近的工党站稳执政地位；最后，绿党甚至可以透过与工党之间的默契，经由领导人的定期会面等方式，介入影响政策方向。

然而现实中，Bale & Dann 指出，由于绿党与工党的支持关系仍属于一种特别的、非建制化（ad hoc）的合作形式，双方通常是靠默契而非正式的协议来维系权利义务，这也使得工党对于绿党的政治承诺之履行程度，往往因人而异。例如，绿党对于纽国电价管制政策有很大影响力，圈内人都知道就是建立在绿党共同召集人与纽西兰能源部长的友谊基础之上。相对的，在许多没有这种私人关系的议题上，例如贸易，绿党的介入就经常遭遇官僚软钉子（2002:355-56）。

因此，绿党一直希望与工党有一份正式结盟协议（coalition agreement），让支持与被支持的互动关系有制度性、常设性的安排。相对的，工党则一直回避签署这样的协议。原因之一来自于联盟党的反对。联盟党对于绿党「想要免于执政角色对于政党发展的局限，又想享有执政特权」（ibid. 355），认为是非常令人嫌恶的态度。除此之外，工党与联盟党本身的党籍国会议员，也反对绿党的国会议员拥有比他们更好的接近决策核心的管道。然而最关键的还是工党近乎吃定了绿党不会对它的政策投反对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答应绿党所关切的正式协议问题。

的确，绿党作为一个支持政党最大的两难，就是无法狠下心来对执政联盟投下不信任票，而顶多针对政策个案，提出批判、杯葛或讨价还价。2000 年绿党曾经与其它反对党结合，反对政府的公共医疗法案，已经被视为是很大的「反对」动作，并且因为其罕见，而成为媒体报导焦点。多数的绿党干部仍然倾向——面对一个他们视为「同路人」的工党联合政府——以建设性的介入建言，而非哗众取宠的杯葛或台面下的交换手段来问政（ibid. 357）。

Bale & Dann 指出，「如果协商的条件真的在于有没有能力用另组联盟来威胁对方，那么可想见绿党下次选举后可能仍然是个俘虏政党（captive party），一如上次选举后的情形」（ibid. 360）。这一个论点在2005 年似乎获得验证。当绿党事实上已经准备好，甚至已经表明愿意加入执政联盟，只待「受邀」时，工党却宁愿将内阁席次给予比绿党更小或实力差不多，但意识形态偏向保守的纽西兰第一党和联合未来党，以换取其执政基础的最大稳定，确实是令人遗憾的政治决定。事实上，工党并非完全没有选择，因为纽西兰第一党和联合未来党的席次合计10 席，与绿党和毛利党的合计是一样的。如果不是因为吃定绿党对于工党的包容甚至忠诚，Clark 政府在选取合作伙伴时应当会有更谨慎的考虑。

长期处于几近俘虏状态的绿党，这次终于决定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尤其是因为纽西兰第一党党主席 Winston Peters 素有歧视亚裔移民的恶名，却在新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着实让绿党无法投下「信任」票。因此，绿党决定以缺席（abstention）方式表达对于这次联盟不反对但也绝不信任的立场。至于未来的政策监督或合作，绿党也将逐步跳出支持政党的格局，而以相对较为中立的在野角色自我提醒。

陆、内部组织：如何「绿」？

与工党的矛盾关系反映的是绿党无法回避的外部考验，而在内部的组织发展和运作上，绿党也经常因其主张与原则而面临一些挑战。如同 Russell Dalton（1994, Ch. 9）指出的，绿色政党延续着新社会运动的理想，对于政治有着反传统的另类想象，这样的理想性经常使得绿色政党为了适应主流政治游戏规则，必须处理许多冲突和两难。这个描绘在全世界众多绿党身上都可以发现，纽西兰绿党也不例外，一直在各种原则与现实间找寻平衡。尤其在1999 年独立参选并一口气当选7 名国会议员之后，「是否能够在国会表现中达到更专业的层级，但却不会损及党内民主，以及党员对于社会运动的高度热忱和义务参与」（Dann, 2005:15），就成了绿党发展的最大考虑。

纽西兰绿党虽然没有重复西德绿党成立之初主张的「公职轮替」原则，但也一直有意识地避免权力集中。在1994 年拟定的党章当中，明定每年的党大会为最高意志机构；此外中央设置「委员会」（Green Council），作为党务运作的执行单位。委员会是由（1）各地区双代表（由每一地区选出1 男1 女为代表）、（2）2 男2 女的发言人、以及（3）党务执行委员会（包括男女双召集人、秘书、财务、每省代表各1 名）所共同组成（Dann, 2005:11）。到了2005 年的党纲中，党大会的最高位置不变，「委员会」则由「执行委员会」取代，但成员组成仍与先前类似，并遵守性别平衡原则，包括（1）由党大会选出的2 名党领导（Co-Leaders）、2 名召集人（Co-Convenors）、以及2 名政策召集人（Policy Co-Convenors）；（2）属于中央秘书处的4 名顾问、秘书长、党员秘书、国际事务秘书和财务各1 名；（3）各地方党部（province）选出的执委会联络人（Executive Networkers），依地方大小选出1 或2 名代表，超过2 名就需注意性别平衡原则；以及（4）其它代表，包括 Te Roopu Pounamu 区代表1 名、国会党团（Caucus）代表1 名、以及其它经过执委会同意的代表。

值得一提的是，在执委会中，只有地方党部联络人握有投票权（党章9.2.3）；党领导、召集人乃至国会代表，对于党务执行均无投票权。同样的，在负责政策制订的「政策委员会」中，其组成成员包括2 名政策召集人、2 名党领导、国会党团代表、地方党部之政策联络人（policy networker）以及经过政策委员会项目任命的工作小组；但这个委员会中也只有地方党部的政策联络人有投票权。这样的行政和决策过程设计，充分反映出绿党有心落实「由地方到中央」的草根民主精神。

既然党的决策是以地方党部为核心，接着也有必要了解一下绿党地方组织的运作方式，因为它关系着绿党草根运动的持续。根据绿党2005 年公布的党章条文，绿党的最基本的组织单位是「小组」（group），它是由5 名以上的缴费党员依照各自认同和社群所组成的，目的是合作以落实党纲的目标。也就是说「小组」基本上是议题与运动取向的。而每个小组将依照其地理疆域而隶属于「地方党部」（province）；一个地方党部至少要涵盖相当于3 个选区（electorates）的规模，并且选出1 名地方党部召集人、1 名执委会联络人（若该地方党部的规模超过12 个选区、则可选出2 名联络人）、1 名财务、以及1 名政策联络人。目前绿党共有9 个地方党部。

任何认同绿党的人（并不一定要具备纽西兰公民身份），基本上经执委会核定并缴费后即可入党。在党员资格方面，绿党属于刚性政党，也就是加入绿党的前提是不得有其它纽西兰政党的党籍（但拥有其它国家绿党党籍者仍可加入纽西兰绿党）。每一位党员都有提名及被提名为各级组织代表以及公职候选人的权利，也可以参与投票决定不分区代表名单顺序。虽然中央执委会是由地方党部选出的联络人（Networker）参加，但基本

上所有党员都可以出席参与开会，其发言权利也由党章明文保障（党章9.8）。此外，只要有缴会费的党员，亦可出席每年的党大会，但是投票权的赋予，系限定每选区5名党员有1名代表可投票（6-10名党员则可有2名党代表）。

从以上对于党务组织的介绍，可以看出绿党刻意将地方置于中央之前的努力。这个安排除了落实草根参与的理想之外，也刻意限制国会议员对于党务的发言权，以平衡国会议员所拥有的体制内资源。相对于国会议员不能太干预党务，中央执委会则有权派代表参与任何一场国会党团的会议，以便掌握立法问政概况。此外，党章也明文规定每位国会议员必须捐出其总收入的十分之一，供党务运作之用。根据Dann（2005）的统计，绿党的党务运作费用中，有一半就是来自国会议员的捐款责任额（另外二分之一分别来自党费和小额捐款）。从2002年选后，国会党团更进一步决定每位议员花在办公室行政助理的预算，不超过其助理总预算的一半，而将剩下预算保留给绿党的「外展协调者」（outreach co-ordinators）。

「外展协调者」专职项目人力的设置，某个程度化解了绿党内部「党务组织最小化」的一贯主张，与需要专职人力发展组织的现实之间的两难。一般人可能难以想见，直到1999年大选之际，绿党整个党部仍仅有一名党工，且是名兼职的行政人员；其它包括召集人、发言人、地方党部联络人等职位全系义务兼任。大选过后的12月，有鉴于绿党选上9名国会议员，当时担任共同召集人的Dann因此建议党部专职人力应当扩张，以因应日渐增加超出义工可以负担的工作量。然而这个提案在执委会「引发激烈的辩论，尤其是来自一个地方党部的强烈反对」（Dann, 2005:12），直到2000年4月仍无法有所结论，Dann甚至被批评「想把绿党公司化」（ibid. 23），因此愤而辞去共同召集人职位。执委会后来终于通过设立一个「党务发展协调者」（Party Development Co-ordinator）的职位，因此增聘了一名专职。不过Dann指出这个人力光是应付执委会的行政工作就已经忙不过来，很难兼顾基层运动的发展（ibid. 13）。

因此，在2002年设置了「外展协调者」专职之后，如今绿党有四名协调者被以项目契约方式聘任，分别负责「零废弃物」「公平的经济体」「社会与经济正义」和「环境健康与安全」这四个绿党关切的核心领域。在并未违反党部本身官僚极小化的大原则下，此一任务小组的设置不仅协助维系绿党的草根运动性，也有助于深化绿党党部和国会党团的政策主张。

柒、小结

本文回顾了纽西兰绿党艰辛的发展历程，并对这个绿色小党目前面临的外部 and 内部压力及其因应策略，做了简要的介绍。纽西兰绿党的诸多经验，与在类似时代社会脉络下诞生的其它各国绿党，甚至其它运动型小党，都有相仿之处，因此可以彼此学习壮大，而这正是全球绿党积极串连结盟的原因。透过回顾纽西兰绿党的发展经验，作者提出两点分析作为暂时的结论：

一、对小党发展的启发：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认为个体（包括政党）因为镶嵌在制度（包括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以及历史之中而受到影响，但同时，个体也有能动性足以策略地、选择性地回应制度和历史的制约（李英明，2004）。从结构面来看，纽西兰绿党的诞生受到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影响，同时接收了生态政治学、新左派、批判理论等论述启发，这些论述基本上已经形成了结构性的作用，对社会中某些主体会有召唤的作用。所以只要社会运动存在，只要批判理论继续发展，就持续为绿党累积结构性的能量。当然，选举制度的改变，更是清楚地说明了体制内的制度设计，对于小党的发展（与打压）尤其具有直接而强大的效果。

另一方面从小党作为一个个体（行动者）的角度来看，我们也看到纽西兰绿党如何在结构的限制下，透过结盟和支持的方式来壮大力量。绿党在错误尝试的过程中学习成长，但不曾因为现实政治文化而过于妥协；相反的，绿党一直反思地、策略地在现实与原则信念中求取平衡，并且始终维持内部民主的沟通机制，也因此逐渐茁壮。当然，这并不表示只要坚持原则，小党就可以赢得选票。事实上从纽西兰绿党的经验中，我们也应当认知到偶发性（contingency）的真实存在——有时候万事俱备，结果却不见得如预期。也因为这样的认识，我们不需要因为几次的失败而气馁，而应当持续地反省策略、累积实力、突破限制。

二、对多元民主的启发：观察纽西兰过去十年来因为选制改变而孕育的多党政治生态，我们看到了多党政治深化民主的潜力。因为没有绝对多数党，所以执政党必须谦虚，必须放低姿态争取其它小党的信任，甚至必须释放权力、开放参与。因此，从实践沟通理性和审议民主的角度而言，这是一个比两党政治更为理想的模式。近年来台湾在谈论政党政治时，经常有人认为小党会造成政治的「不稳定」，本文认为这是一种保守的想象。事实上，当任何一党掌握国会过半的实力时，或许在该届任期内可以取得优势和所谓的「稳定」，但却只是强化了必须夺取执政权才能翻身、全有或全无的零和思维，而不是政党之间的诚意沟通与理解。这样的大党对立政治，容易压抑社会内部多元的政治主体与主张，造成非黑即白的二分对立氛围，甚至每每因为政权更替而出现社会不稳定。因此，纽西兰多党政治对于多元民主的体现，是一个值得我们继续观察的经验。

最后，因为数据来源与篇幅的限制，本文对于纽西兰绿党的实践经验仍有诸多未能触及之处，或未能进一步理论化，为本文之局限。尤其是纽西兰绿党过去几年推动的政策内容和影响，对于理解小党的影响非常关键，就这一点而言，本文仅以附表三统计绿党自1997年以来发布的新闻稿，以此看出绿党关切的各种议题，但对于其政策形成与推动过程，是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之处。无论如何，作者希望透过此一初探研究，激发未来更多关于绿党政治的比较研究与理论化分析。

参考书目

1. Aimer, Peter and Paymond Miller. 2002. "Partisanship and principles: Voters and the New Zealand electoral referendum of 1993."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1:795-809.
2. Bale, Tim and Christine Dann. 2002. "Is the grass really greener? The rationale and reality of support party status: A New Zealand case study." *Party Politics*, Vol. 8, No. 3, pp. 349-365.
3. Blakers, Margaret. 2001. (ed.) *The Global Greens. The Australian Greens and the Green*

Institute.

4. Capra, Fritjof and Charlene Spretnak. 1984. *Green Politics*. E P Dutton. 杨祖珺、蔡式渊译 (1986) 《绿色的抗议》。前进出版社。
5. Dalton, Russell J. 1994. *The Green Rainbow: Environmental Groups in Western Europe* (Ch. 9, pp. 213-40). Yale University Press.
6. Dann, Christine. 1999. *From Earth's Last Islands: The Global Origins of Green Politics*. Unpublished Ph.D. thesis. Lincoln University, NZ.
7. Dann, Christine. 2005. "Experiment evolution down under: Thirty years of Green Party development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In B Rihoux, P Lucardie and E G Frankland (eds.) *Green Parties in Transition: The End of Grassroots Democracy* (Ch. 14).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8. Frankland, E. Gene and Donald Schoonmaker. 1992. *Between Protest and Power: The Green Party in Germany*. Westview Publisher.
9. Poguntke, Thomas. 1994. *Alternative Politics: The German Green Part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0. Woodin, Michael and Caroline Lucas. 2004. *Green Alternatives to Globalization: A Manifesto*. New Century Publishing. 邓伯宸译 (2005) 《绿色全球宣言》。立绪文化。
11. 李英明。2005。《新制度主义与社会资本》。扬智出版社。
12. 刘东国。2002。《绿党政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声明:1. 本网站为纯公益性学术网站, 无任何商业目的。因部分文章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请来邮或来电告知, 本站将立即改正。
2. 刊载此文并不代表本网站同意其观点, 仅为提供更多信息, 以作参考。

[关闭]

Copyright@ 2004-2005 版权所有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学研究院 All Rights Reserved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珞瑜路 152 号 E-mail: ccnu cp@163. com

鄂 ICP 备 06017897 号